

# 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地方化和民族化

于 卫 青

(湛江师范学院 法政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48)

**摘 要:**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地方化和民族化是信奉伊斯兰教、以传播伊斯兰教为己任的阿拉伯民族和信奉祆教的伊朗波斯民族在全面接触和深层交往中逐渐实现的。伊朗与阿拉伯的早期交往奠定了两个民族交往的历史基础,阿拉伯人对伊朗的军事征服是伊斯兰教在伊朗传播的前提条件。在阿拉伯穆斯林的统治下,波斯人一直处于劣势和被动。在政治和宗教生活中,阿拉伯穆斯林对波斯祆教徒进行诱惑和胁迫。经济生活的困境使波斯祆教徒大批改宗伊斯兰教。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和通婚削弱了祆教群体。在文化交往中,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逐渐在伊朗占据主导。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地方化和民族化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什叶派在伊朗的传播和发展上。

**关键词:** 伊朗; 祆教; 伊斯兰教

**中图分类号:** D5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4702(2005) 01- 0001- 06

伊斯兰教由单一的阿拉伯民族信仰的民族宗教发展为多地区、多民族信仰的世界性宗教,是在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多个层次、多种形式的相互交往中实现的。公元 7 世纪中叶,阿拉伯人组成的穆斯林军队占领了伊朗全境,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全面接触,伊斯兰教也开始在当地传播。在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数百年的交往过程中,伊斯兰文明和祆教文明相互碰撞、沟通、渗透、吸收,其最终结果是伊斯兰教在伊朗地方化和民族化的实现,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在伊朗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等各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伊朗的绝大多数祆教徒逐渐放弃了自己的祆教信仰,陆续接受、信奉了伊斯兰教。

## 一、伊斯兰教传布于伊朗的基础和条件

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地方化和民族化是信奉伊斯兰教、以传播伊斯兰教为己任的阿拉伯民族和伊朗信奉祆教的波斯民族在全面接触和深层交往中逐渐实现的。这是在具备了一定的历史基础和前提条件下

发生的。

### (一) 伊朗与阿拉伯的早期交往

所有的交往形式的首要因素就是地缘空间。人类的文明交往总是从邻近地区的接触开始的,伊朗和阿拉伯地区地理上的比邻是两者最早发生交往的物质基础。

“各民族、各国家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sup>[1](P3)</sup> 公元 7 世纪前,游牧的阿拉伯人还是一盘散沙。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沙漠生活的经济状况、习以为常的血亲复仇,使阿拉伯人内乱不休,无暇外顾。而邻近的伊朗(古称波斯),早已跨入先进文明的行列,建立起了强大的国家,拥有能征善战的军队,无疑在对外交往中占据着优势和主动。

由于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交往大多发生在接壤地区。在北阿拉伯的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北部的沙漠外围相继兴起了几个阿拉伯小国。它们在东面的波斯萨珊帝国和西面的罗马帝

收稿日期: 2004- 11- 26

作者简介: 于卫青(1970— ),男,山东高唐人,湛江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史学博士,从事世界史和中东研究。

国之间争夺商路控制权的斗争中起着缓冲作用。萨珊王朝的开国之君阿达希尔在波斯和阿拉伯边界的希拉扶植了一个阿拉伯的莱赫米部落作为附庸国。既可阻止阿拉伯游牧部落的侵扰,又可利用阿拉伯人作为战争的辅助力量。在经济和文化上,希拉与阿拉伯内地联系密切,被视为阿拉伯社会的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据载,“麦加的古莱西人从希拉学得写字技术和‘赞达盖’信仰,后者大概是古代波斯的‘光阴’(时间)信仰”。<sup>[2](P23)</sup>可见,这些边境小国是外部文化影响阿拉伯半岛的重要途径。

战争交往是古代的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在阿拉伯半岛北边,阿拉伯游牧部落同波斯发生过多次军事冲突。但是,“过去无论从物质方面还是其他条件来看,阿拉伯半岛吸引不了那些有野心的外围政权。”<sup>[3](P22)</sup>希罗多德提及大流士时评论说:“阿拉比亚人从来就没有被波斯征服过。”<sup>[4](P401)</sup>所以,波斯同阿拉伯人的战争无论规模、程度都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公元575年,波斯国王派遣军队赶走了也门的埃塞俄比亚驻军,然后把它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变成波斯的一个省。萨珊波斯对阿拉伯商路的争夺和控制,对阿拉伯地区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毗邻地区,伊朗与阿拉伯存在着广泛的物质、文化交往。“阿拉伯部族中有些部族与周围邻近的文明发达地区有来往,或者这些文明发达地区的商人、旅行者和宗教宣传者曾来到这些阿拉伯部族里。”<sup>[3](P23)</sup>从文化交往的角度看,由于地理、种族等原因,阿拉伯人在宗教上主要受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萨比教(拜星教)和波斯的祆教也曾传入,但影响甚微。

伊朗和阿拉伯的早期交往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先进、强大的伊朗在与阿拉伯人的交往中占据优势,处于主动。其二,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和各自发展阶段的不同,伊朗和阿拉伯的早期交往规模、程度、范围非常有限。其三,早期交往毕竟沟通了伊朗和阿拉伯的多方面联系,为两大民族的直接、全面、深入交往奠定了历史基础。

## (二) 阿拉伯人对伊朗的军事征服

阿拉伯人对萨珊波斯的军事征服是一场规模巨大、范围广泛、影响深刻的战争交往形式。它改变了伊朗历史的发展进程,为以后阿拉伯民族和伊朗波斯民族的全面交往创造了全新的条件。从公元634年进攻希拉始,十几年之中,阿拉伯军队所向披靡,迅速席卷伊朗。从文明交往的角度看,军事征服的过程及后果远远超出了军事胜负的意义。

首先,战争引发了民族迁移。对于阿拉伯游牧民

族来说,“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原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需要愈来愈多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形式也就愈来愈广泛地利用着。”<sup>[5](P23)</sup>与这种战争形式相伴随的,是大规模的民族迁移运动。起初,哈里发把以氏族为单位派出的远征军组编为常备军,登记造册,领取年俸,连同随军迁出的家属都驻扎在各地新建的军营里。随着征服战争的结束,他们定居下来,仿效被征服地区的贵族,占有土地,驱使奴隶为其耕种。以军营为中心发展为新兴城市,并与附近的原住居民发生广泛交往。大量的阿拉伯军队及其家属进入伊朗,并驻扎在各地的军营里。这些军事营地吸引了新皈依者和当地居民的不断涌入,逐步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宗教中心,在巩固被征服地区和传播伊斯兰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战争扩充了穆斯林的队伍。早在公元632年,也门的波斯总督和他的军队就改信了伊斯兰教。公元637年,阿拉伯人取得卡迪西亚战役胜利后,战败的波斯军队大批加入到阿拉伯军队,并改信了伊斯兰教。根据迪奈特的记载,“改信后的被俘士兵可以获得自由,并可在以后的战斗胜利中分得战利品”。<sup>[6](P116-117)</sup>与此同时,伊朗的大批祆教贵族、法官、地主为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特权而放弃祆教信仰,改宗伊斯兰教。大部分祆教徒则成为自愿纳人丁税、保留自己原来信仰的顺民。在军事征服时期,自愿改宗伊斯兰教的通常是出于政治压力、经济诱惑,而不是宗教原因。

再次,确立了阿拉伯人的统治地位。在伊朗建立了阿拉伯人的统治,是军事征服的直接后果,也是其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交往的政治前提。自此,阿拉伯人成为伊朗的统治者,阿拉伯语成为官方语言,伊斯兰教作为统治者的宗教特别得到大力提倡和推行。

最后,祆教在伊朗丧失了国教地位。

阿拉伯人征服前,祆教是伊朗(萨珊波斯)的国教。萨珊王朝时期,祆教神庙占有大量的土地,并经常得到慷慨的捐献。祆教上层祭司是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祭司集团通过各种复杂的仪式活动,可从信徒手中得到大笔的收入,而且掌握了司法大权。随着萨珊帝国的灭亡,祆教祭司集团的所有特权全部丧失,这对祆教的生存和发展是个沉重打击。

在军事征服阶段,军事上惨败的波斯人在交往中完全处于被动,甚至他们的生命安全、社会地位都取决于阿拉伯统治者。但是,作为深层次的伊斯兰教和祆教之间的文明交往的后果,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地方化和民族化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 二、伊斯兰教在伊朗地方化和民族化的历史进程和特点

军事征服后,阿拉伯人开始直接统治伊朗。由于阿拉伯帝国的建立是阿拉伯穆斯林以伊斯兰教为思想旗帜,在经济利益的推动和圣战热情的鼓舞下建立起来,他们以扩大“伊斯兰教地区”为己任,所到之处致力于传播伊斯兰教。所以,阿拉伯统治下的民族交往的各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伊斯兰色彩。伊斯兰教在伊朗的早期传播是在阿拉伯人数百年的统治下进行的,是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交往的结果,是伊斯兰文明和祆教文明交往的产物。这一进程主要表现在:

### (一) 阿拉伯人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优势

阿拉伯人的政权建立后,改宗的新穆斯林的政治地位高于坚持原信仰的“有经者”(顺民),并有机会参与政权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而绝大部分未改信的祆教徒则成了穆斯林统治下的顺民。

但是,伊斯兰教在伊朗传播的最初一个世纪期间,穆斯林只是伊朗的人口中的少数,大批改宗的现象也不多见。在伊朗,阿拉伯穆斯林统治者面对大量祆教徒的存在,往往千方百计诱迫他们改宗。史载,“屈底波占领布哈拉时,当地居民每逢一年两次的市集,总是群赴火庙拜火。于是,穆斯林在那里另建一清真寺,劝导居民信仰伊斯兰教。这样,他们就成了穆斯林。但当劝导者离开后,他们又不是穆斯林了。屈底波曾三次使他们改信伊斯兰教,结果是信了又背弃。屈底波又下令祆教徒的房屋一半供穆斯林居住,以使伊斯兰教义对他们产生影响。他又在城中建了一个大清真寺,取代先前的火庙,要居民每星期五去那里礼拜,并答应每人因此可得两个钱币。但只有穷人前往,富人并不在意两枚钱币。”<sup>[7](P215)</sup>倭马亚王朝早期,出于稳定局势的需要,阿拉伯统治者一度实行宗教宽容的政策,允许祆教徒交纳人丁税并保留自己的原来信仰。但是,哈里发欧麦尔二世(公元717~720年在位)即位后,采取鼓励改宗的经济政策:凡是穆斯林,无论他是不是阿拉伯人,都不需要交纳任何赋税。非穆斯林一旦改奉伊斯兰教,其土地即归公有,但他本人可以作为租用者继续使用那份土地。<sup>[8](P253)</sup>同时,欧麦尔二世继续推行阿拉伯化,把种种侮辱性的限制强加于异教徒。他的措施加速了帝国的伊斯兰化,不少祆教徒为享受这种经济上的特权而改信了伊斯兰教。阿拔斯王朝最初的1个多世纪,归依伊斯兰教的人逐渐增多。哈里发哈伦、穆塔瓦基勒关于信仰的立法,促进了皈依伊斯兰教的进程。公

元783年,71岁的麦赫迪颁布改宗法令,强制异教徒个别或集体改宗,大批的祆教徒在这场运动中被处死。<sup>[9](P181)</sup>失去保护的祆教徒成了暴力冲突的牺牲品,公元697~700年,库姆的许多祆教徒被穆斯林杀害。公元8世纪中叶,胡拉米亚(khurramiyya)起义被镇压后,赖伊地区的许多祆教徒被处死。布维希朝时,祆教徒不得时常寻求保护,以对付狂热的穆斯林的迫害。塞尔柱人统治时期,祆教徒甚至不敢在公共场所公开自己的身份。<sup>[10](P209)</sup>伊朗祆教徒的政治处境越来越艰难。在阿拉伯统治者政治上的诱使、强制下,大批的祆教徒陆续改信了伊斯兰教。

### (二) 波斯祆教徒的经济困境

穆斯林每征服一个地区,就对当地的异教徒提供3种选择:或者被杀死;或者改信伊斯兰教;或者保留原来的宗教信仰,但是必须交纳人丁税,成为穆斯林统治下的顺民。绝大部分祆教徒作出了第3种选择,但人丁税非常沉重。有些人因交不起而沦为奴隶,处境悲惨。交人丁税的顺民本身社会地位就低人一等。史载,“顺民交纳人丁税时,必须站着,官员则坐着。顺民必须表现出低人一等的模样。他手掌摊开着,官员接受后就猛击他的颈部,旁边的随从令他马上滚开。公众被允许在场观看这种情景。”<sup>[7](P215)</sup>社会地位低下的顺民如果改信伊斯兰教就不必交纳人丁税,并可提高一定的社会地位。这对祆教徒来说,无疑很有诱惑力。

祆教徒和穆斯林长期共处,在商业、贸易领域存在着频繁的交往。起初,祆教徒与穆斯林的经济往来受着本教教规的束缚。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这些教规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贩卖牛和卖酒是祆教教义禁止的恶行,但是在阿拉伯人统治下的穆斯林社会,这些教条不得不有所变通。10世纪的祆教大祭司在《教义问答》中讲到,对一个祆教徒来说,贩卖牛给穆斯林是有罪的,除非这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时,卖酒给穆斯林也开始得到许可,祭司们的合理解释是卖酒给饮酒适中的穆斯林有助于其止恶扬善。这些记载反映了祆教徒困难的经济状况。在经济交往中,穷困的祆教徒对穆斯林形成严重的倚赖。祆教徒经济上受制于穆斯林,在诱惑和胁迫下,易于屈从于穆斯林的要求,并导致宗教上的改宗。

### (三) 祆教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削弱

萨珊朝时,祆教的祭司们有权力制定或加强教规,并决定是否与非祆教徒团体来往。但是在阿拉伯人征服后,祆教失去了政治权力,被迫在政治弱势的基础上同穆斯林打交道。

随着改宗者的出现,如何对其处理的问题随之出

现。在祆教经典和《教义问答》中,祆教祭司们劝导信徒远离异教徒,并把改信其他宗教视为不赦之罪(margarzan)。改宗伊斯兰教者被视为叛教者,将予处死或被逐出祆教社区。改信者的财产和继承权也被完全剥夺,他的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会降低,为人歧视。如果改信者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悟,祆教社团可以重新接受他,允许他忏悔。可是,所有这些企图阻止改宗的规定在穆斯林的统治下根本不可能得到执行。相反,一个已经改宗了伊斯兰教的人如果悔悟并企图回到他原来的祆教信仰,就会被伊斯兰教看作背教者。按照伊斯兰教法,这个人要么重新表明他的伊斯兰教信仰,要么被处死。其结果是祆教徒的数目只减不增,穆斯林的人数越来越多。10世纪时,穆斯林制定法律,“改信伊斯兰教的新穆斯林有权继承其家庭的所有财产”。<sup>[11](P159)</sup>这些法律地位的不平等也使许多祆教徒改信伊斯兰教。与穆斯林通婚、发生性关系被祆教看作可耻的行为,因为它直接导致一个祆教徒宗教纯洁的丧失。《教义问答》上说“祆教徒与穆斯林发生关系而致穆斯林女子怀孕生下孩子的,此人死后无法走过分别之桥,而堕入地狱。如果祆教女子与穆斯林男子发生关系,生下的孩子年过15岁而仍为穆斯林,那个怀孕的祆教女子即为不赦之罪。”<sup>[7](P356)</sup>然而,在穆斯林社会,这种信条的约束力越来越小,祆教徒与穆斯林的通婚现象越来越普遍。改信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往往编造一个家谱,把自己的祖先和阿拉伯人联系起来。男性穆斯林和女性祆教徒的孩子们继承了他们父亲的身份和信仰,成为穆斯林的成员。即使仍然秘密信奉祆教的穆斯林,他们的后代通常在伊斯兰教社会成长起来,失去了和祆教的联系,就逐渐变成了真正的穆斯林了。

在此形势下,祆教团体越来越弱,越来越小,逐渐失去对信徒社会生活的控制,而又不屈从于穆斯林的管辖和法律。伊朗的祆教徒越来越少,有的逃到人迹罕至、环境恶劣的克尔曼和亚兹特,有的远渡印度另图发展。

#### (四) 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主导地位的确立

伊斯兰教代替祆教成为波斯民族的主要信仰是在文化交往过程中逐步实现的。文化交往是最深层次的交往,它与其他形式的交往结合在一起,历时长久,影响深远。这种交往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学和宗教神学两个方面:

首先,在语言文学方面。公元700年左右,阿拉伯语成为伊朗的官方语言。在和阿拉伯人的交往中,波斯人学习掌握了阿拉伯语,并用阿拉伯语从事学术文化活动或从事创作。翻译运动中,大量的祆教作品

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祆教徒在书写时认为阿拉伯字母比先前的钵罗婆字母更简便,于是用阿拉伯字母对中古波斯语进行了改造。大概9世纪时,新波斯语的文字就用改变后的阿拉伯字母书写,并逐渐在各地推广使用。

语言是思想交往的工具,文学则是思想交往的具体体现。阿拔斯王朝跨时代诗人巴夏尔·本·布尔德文学造诣高超,“他第一个打破了他之前大部分诗人盲目遵循的仿古方法,将文学与生活紧密联系,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为阿拉伯诗歌革新打开了广阔的领域,并为它作出了范例。”<sup>[12](P265)</sup>这位诗人是个地道的祆教徒,公开作诗宣扬祆教,结果为哈里发鞭挞而死。苦行诗人艾布·阿台西耶倾向祆教,在一些诗歌中宣扬二元论思想。阿拉伯散文的主要奠基人伊本·穆格发表面归依伊斯兰教,秘奉祆教。他的翻译、创作作品都鲜明地体现他的复兴波斯人文化的真实思想。这种祆教思想的流露引起了阿拉伯统治者的高度警惕,并遭到沉重的打击。这些现象反映了波斯民族由祆教信仰向伊斯兰教信仰过渡时在文化上出现的某些状况。

其次,在宗教神学方面。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文化交往在宗教领域得到充分体现。在祆教和伊斯兰教的相互碰撞、渗透和吸收中,祆教对传入伊朗的伊斯兰教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祆教和伊斯兰教在宗教思想的冲突和争议使两种宗教发生神学思想上的碰撞、沟通和交流。面临着伊斯兰教的强大压力和威胁,相当一部分祆教徒改信了伊斯兰教,另一些祭司依然研究祆教经典,并创作了新的钵罗婆文经典以阐发教义,与伊斯兰教进行神学辩论。在阿拔斯朝百余年的翻译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热衷于宣扬波斯文化的文人,一些祆教的神学观念也带进了伊斯兰教。这两种交往“无论筛选、加工、改造的标准如何,它都以所传播地区和接受伊斯兰信仰诸民族的原有信仰、习俗、文化是否适应伊斯兰教的传播、发展为转移。他们在保留那些适应伊斯兰教发展需要的成分或因素的同时,抛弃那些不适应、甚而相对立的成分或因素。”<sup>[13](P24)</sup>对伊朗而言,其结果是:一方面确立了伊斯兰意识形态的神圣地位,另一方面注入了深厚的祆教思想传统。

#### (五) 什叶派在伊朗的传播

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地方化和民族化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什叶派在伊朗的传播和发展上。什叶派在政治上源于阿拉伯人的内争,在神学思想上则深受祆教的影响。祆教有重视“尘世强权”的思想,萨珊朝的国王号称“王中之王”、“神”、“神的后裔”,萨珊朝的国王

必须出自萨珊家族。萨珊朝沙普尔的功德碑铭文中, 他自称: “我, 沙普尔, 马资达的崇拜者, 伊朗和非伊朗的王中之王, 属于诸大神的种族……”<sup>[7](P192)</sup> 萨珊朝末年, 篡权称王的贵族白赫兰因出身不是王族而被其他贵族反对, 认为他的行径亵渎神灵。与逊尼派相比, 什叶派的基本特征是伊玛目及其隐遁说。该派认为, 只有先知的后代、阿里及其直系后裔伊玛目才是最高的宗教和世俗领袖, 除此之外, 其他的哈里发都是篡权者。伊玛目是真主特选的, 具有神性, 从不犯错误。什叶派的伊玛目的神圣性和严格继承原则与祆教的王朝正统主义、君权神授思想非常一致。圣裔崇拜在穆斯林世界广泛流行, 什叶派特别强调圣裔伊玛目的中保和说情作用。在伊朗广泛流行着一种传说: 伊玛目侯赛因娶了征服时期沦为俘虏的伊朗萨珊朝末代公主为妻, 所以历代伊玛目都有波斯血统。<sup>[14](P172)</sup> 这是圣裔崇拜在富于正统主义思想的波斯民族的特殊表达方式。在伊朗, 逊尼派和苏非信徒普遍流行圣裔崇拜, 与什叶派在感情上比较接近。什叶派认为, 最后一位伊玛目并没有死, 安拉让他隐遁起来。他奇迹般地活着, 直到安拉让他再世。末日审判之前不久, 他将作为马赫迪返世, 战胜恶魔达加勒和苏富扬, 实现太平盛世。祆教也有类似的隐遁思想。祆教的先知琐罗亚斯德在《伽泰》中也曾经预言, 弗拉克勒底到来之际, 将有苏什扬特(“那将带来福乐的人”)出世, 带领人类与恶魔进行最后的决战。早期祆教徒把琐罗亚斯德和苏什扬特联系起来, 创作了一个传奇故事: 琐罗亚斯德的精液贮藏在喀萨亚湖的深处。末日到来之际, 有处女在湖里沐浴, 怀孕并生下琐罗亚斯德的儿子, 叫阿斯特伐勒特(意为“那成了肉身的正义”), 他就是苏什扬特。<sup>[7](P75-76)</sup> 我们可以从这一传说中可以看到什叶派“隐遁”思想的影子。

伊斯兰教对祆教思想的吸收主要通过改信了伊斯兰教的原来的祆教徒。他们有的表面信仰伊斯兰教而内心保持着祆教信仰, 有的虽然改信仍受着原来的宗教信仰的影响。他们从祆教信仰的角度来解读、发展伊斯兰教。从某种意义上说, 什叶派是伊斯兰教在伊朗地方化和民族化的产物。

公元11世纪后, 波斯的祆教徒绝大多数居民接受了伊斯兰教。波斯人接受了阿拉伯人的宗教和语言, 而在其他方面对阿拉伯人不断施加影响。1502年, 创立沙法维朝的伊斯玛仪一世宣布什叶派为国教。自此, 什叶派作为国教的地位稳固地确立起来。迄今, 伊朗的穆斯林91%属于什叶派。

### 三、结 语

在近400年的文明交往中, 历史悠久、根基深厚、

长期作为伊朗国教的祆教终于被伊斯兰教取代, 尽管还有极少量的祆教徒顽强地承传下来, 仅仅是苟延残喘而已。据此, 我们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 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地方化和民族化是阿拉伯人主导传播、波斯民族被动接受伊斯兰教的过程, 是穆斯林和祆教徒长时期、多方面交往的结果。失去了政权的祆教徒, 在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并对其虎视眈眈的社会环境里, 处境艰难。经济上的诱惑、政治势力和社会地位的奢望, 诱使一部分祆教徒改宗。沉重的侮辱性的捐税、人身自由和安全的威胁、被侮辱和歧视的遭遇, 迫使大部分祆教徒陆续改宗。祆教徒人数的不断减少、穆斯林人数的不断增加是对祆教的致命打击。以农耕生活为主的祆教徒, 面对阿拉伯人的强势和攻势, 无力反击和固守。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推广、波斯语的改造, 使祆教的钵罗婆文成为僵化的语言。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祆教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 无力捍卫自己的宗教传统。在与伊斯兰教的交往中, 祆教完全处于被动和弱势, 最终为伊斯兰教所取代。

其次, 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地方化和民族化过程也是波斯民族以自己的文化传统改造伊斯兰教的过程。“伊斯兰教在它的传播地区之所以能成为统治的宗教, 这些地区的民族之所以乐意接受伊斯兰教的信仰, 仅仅靠军事的或强力的手段是无法实现的。它只有使伊斯兰的意识形态与所传播地区民族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有机的融合起来, 才得以生根、发展, 逐步完成它的地方化和民族化的过程。”<sup>[13](P23-24)</sup> 虽然什叶派只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支派, 但似乎注定了与波斯民族发生特殊的联系。什叶派源于阿里及其后裔与倭马亚王朝的权力斗争。斗争失败后的什叶派人由政治派别发展为宗教派别, 一直坚持反对非阿里家族的当权者的斗争, 因此也一直受到居于统治地位的逊尼派的压制和迫害。阿拉伯人的征服使广大波斯人感到屈辱, 即使改宗伊斯兰教的波斯人也一直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对阿拉伯统治者的不满使他们同情什叶派, 随时愿意加入什叶派反对现政权的斗争。“什叶派运动反映了波斯人对阿拉伯侵略者的怨愤和抗争, 换言之, 是波斯民族运动的宗教外壳。”<sup>[15](P345)</sup> 伊斯兰教传入后, 具有悠久的祆教文化传统的波斯人自然按照其特有的思想观念去解读和发展这一的外来宗教。他们用祆教固有的王朝正统主义和君权神授观念去理解什叶派主张的神圣的伊玛目世袭制、神权政治思想, 不断给什叶派教义注入波斯的内容。换言之, 波斯人以什叶派的形式保持了本民族的传统文明特性, 什叶派教义成了伊朗民族意识的重要内容。

最后,从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地方化和民族化进程可以看出,世界历史上的某种文明的兴衰存亡系于和其他文明的交往。只要和其他文明发生交往,这种文明就不会完全消亡。即使它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等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它的部分仍然可以在其他文明形

式中存在和延续。交往中的各种文明之间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从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形成有别于交往前的新文明。区别在于,哪一种文明占据主动和强势地位,哪一种文明为主体的质的界定,哪一种文明成分占多少的量的差别。

### 参考文献:

- [1] 彭树智. 中东史卷首叙意[J]. 中东研究, 1999, (35): 1- 5.
- [2] 金宜久. 伊斯兰教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3] 阿巴斯·艾克巴尔·奥希梯扬尼. 伊朗通史[M]. 叶奕良译,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 [4] 希罗多德. 历史[M]. 王以铸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5]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6] Daniel C. Dennet, Conversion and the Poll Tax in Early Islam, Cambridge, Mass, 1950.
- [7] 龚方震, 晏可佳. 祆教史[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 [8] 希提. 阿拉伯通史[M]. 马坚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9] 蔡伟良. 灿烂的阿拔斯文化[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 [10] Richard N. Frye, The Golden age of Persia: The Arabs in the East, London, 1975.
- [11] 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Beliefs and Practices, London, 1979.
- [12] 汉纳·法胡里. 阿拉伯文学史[M]. 鄧溥浩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 [13] 金宜久, 吴云贵. 伊斯兰与国际热点[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 [14] 昂里·马塞. 伊斯兰教史[M]. 王怀德, 周祯祥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 [15] 谢·亚·托卡列夫. 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M]. 魏庆征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 [16] 彭树智. 文明交往论[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 [17] 李铁匠. 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18] 王新中, 冀开运. 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Local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of Islam in Iran

YU Wei- qing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School, Zhanjiang Normal College,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48, China)

**Abstract:** The local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of Islam in Iran came true gradually as a result of the comprehensive contact and deep- goi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Arabian and the Persian peoples. The early contact between the two peoples laid down a historical basi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Iran was conquered by Arabs in the 7th century. Under the Arabian rule, the Persian people took a passive and an inferior position in political, economic, law and cultural fields. Because of these, during the following 400 years, the over- whelming majority of Zoroastrians were converted to Islamism. The characteristic was embodied in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Shiah in Iran.

**Key words:** Iran; Islam; Zoroastrianism; Shiah